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三三期 ——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1d)

【亡灵祭坛】	公祭王佩英：黑暗时代留下来的一抹光亮	杨银波
【自由论坛】	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秦 晖
【口述历史】	几度风雨几度秋 (中)	李冬民 · 阎阳生 · 米鹤都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公祭王佩英：黑暗时代留下来的一抹光亮

• 杨银波 •

(按：本文是2011年10月25日杨银波在广东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参加“公祭王佩英”活动的现场演讲。)

各位前辈、贤达，大圃叔叔（王佩英第六子张大圃）、可心阿姨（王佩英女儿张可心）、胡杰兄（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拍摄制作者）、“彭青天”彭启安老先生（文革博物馆推动创建者），以及魂兮归来在天空俯瞰着我们的王佩英烈士：

你们好！

晚辈杨银波，是个80后公民，也就是传说中不知文革为何物的一代人，但因为接触到王佩英这一奇案，我感觉确实有话要说，那就是王佩英让我对文革看得十分立体，极为生动。长期以来，甚至有了“她即是我、我即是她”的幻觉。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也许仅仅因为说了个朴素的常识，我很可能就成为另一个王佩英，与她一样被千夫所指、万人所讨，但却不一定有她那样的宁死不屈、抛家为国。即便活在当代，如何避免自己和其他中国公民成为新时代的王佩英，这也尚须国人共同努力。如何让王佩英式的惨痛悲剧不再上演于当代及未来？这是

我今天唯一的呐喊。

文革的本质，是统治者的专制与极权，是民众的蒙昧与盲从。人性泯灭殆尽，法治荡然无存，绝对的个人崇拜，疯狂的全民族洗脑，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文攻武斗，整个国家损失了太多精英、良心，元气大伤。其血腥、其残暴、其险恶、其荒谬，其毫无个人选择余地的任人宰割，其完全丧失了正常治理的愈演愈烈，其野蛮、变态到超出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承受极限，以至于文革至今还被视为禁忌领域，国家解密也可能永远不了了之。这十年，是噩梦，是秘密，是没多少人能干干净地说自己与之毫无干系的一段黑暗历史。

有人说，1976年200多万人的“四五运动”为粉碎文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其实，更早的基础，早已从王佩英这样的抗争中得以体现。王佩英从1962年就开始公开质疑毛泽东在指挥国家上出了问题，而后一次比一次更激烈地表达其意见。她有一种宗教般的赎罪感，眼看国家之危、人民之苦，认为自己身为共产党员有责任来反省自身，发表常识，试图让众人觉醒，呼吁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而不是继续祸国殃民。然而，王佩英的抗争在当时那个神化毛泽东、人人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年代，被一次次压制、斗争、迫害，并最终被残忍杀害。

王佩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千里风雪我独行”的仁人志士，她的所言所行，不是基于性格、道德的缘故，而是基于理想与信念。文革从小发展到大，不断延伸、扩散、升级，自初级萌芽到疯狂肆虐，就如同黑暗一步步吞噬着光明，以至于整个国家最终几近暗无天日，而这个时候有王佩英这样的微光闪耀、星火燃烧，纵然在风声鹤唳之中被无情扑灭，但她这种“照想的去说，照说的去做”的朴素抗争，却被历史证明其伟大，其高尚，其罕见。《论语》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正义而牺牲生命，视死如归，舍生取义，这种精神高度，应被我们每个人所景仰。

文革之所以以几百人的力量搅动全社会七八亿人一起疯、一起斗，说到底，问题出在人的心里，而这些心底的恶念放之于国家和社会，就成了最恐怖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乱象。王佩英的言论，发之于肺腑，是忧国忧民、舍己为天下的最纯洁的呐喊，但她没有任何言论保障，由此“被精神病”，被关牛棚，被游斗，被毒打，被隔离子女，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在“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的前四天就被提前杀给全国人民看，被谢富治这样的运动杀手拿着她的鲜血和生命来邀功请赏、突出政绩。她一系列的“被”，说明她当时的处境完全是泰山压顶，可她仍然如同一只蚂蚁、一颗小草一样，拼命抗争着。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明白了，那种泰山压顶的力量，终究不是人性力量的对手。所以，王佩英被彻底平反昭雪，这是今天胜利于昨天的必然。

如果不是这些年知道文革中还有王佩英这样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如此顽强不屈，我真以为文革当中的七八亿人都全然垮掉了，以为那个年代全民族有担当、有良心的人都绝种了，以为诺大一个中国死气沉沉、杀气腾腾、暴虐阵阵、黑云滚滚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好在还有人记得王佩英七年多不间断、不妥协的决绝抗争，好在我这样的80后站在曾被浩劫淹没的历史大门，还看得清谁是英雄、谁是罪人，好在民心所向，有那么多人被王佩英实实在在地震撼、感动、缅怀和赞颂，好在有王佩英这样让我这样的男儿身深深汗颜的巾帼英雄曾经献出生命的奋斗，才使得我立于当今这个时代，在今天“照想的去说，照说的去做”，而且胸中没有任何恐惧。

文革的源头，有人说是五七反右开的头，有人说是大跃进与饥荒导致高层意见分歧从而有了高层权力斗争，而后发展到以广大民众为道具，借刀杀人，争权夺权，试图以乱治天下而未果，反倒是天下乱得黑白颠倒，国不像国，家不像家，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可是在我看来，文革最根本的源头，还是在于人心。与当时被“斗争哲学”疯狂挑动的芸芸大众不同的是，王

佩英这颗心如此心系人民疾苦，如此不惜牺牲生命勇敢直言恶政，忍无可忍地向最高统治者明确表达抗议，同情、声援被无辜迫害的刘少奇等人，坚持主政者必须为民谋福利的朴素思想，并以此为标准，判断勇于批评毛泽东错误执政路线的刘少奇是好人。

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这个罪名，是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的八届扩大十二中全会上定下的，炮制所谓“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来自江青、康生、谢富治的手笔。也是在这一年这个月的21日，王佩英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逮捕，起因是她在公开场合呼喊刘少奇万岁，她也恰恰身处谢富治担任文革委员会主任的北京。在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王佩英如此针锋相对地反抗高层权力体系荒谬的政治决定，此情此景，恰如鉴湖女侠秋瑾当年所叹：“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所以，网上有网友这样感叹道：“共和国的旗帜上有王佩英的鲜血，共和国的国徽上有王佩英的光芒。”

放之于历史，王佩英和王佩英们的不屈反抗，是黑暗时代留下来的一抹光亮，是为结束文革早就埋下的精神种子。放之于当代，她维护正义的精神与气节，应成为民族主流、社会共识、公民信念。放之于当今政府，更应看到弘扬正气、传播良知的重大价值，使在位者深知为民谋福利、推动社会进步才是最大政绩，唯有此，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治局面成为主流。今天我们纪念王佩英，不是向意识形态领域的文革禁忌挑衅，而是深层挖掘和倡导先辈们以鲜血和生命呐喊出的对国家和人民之大爱，这种爱，乃是如此深沉，如此激烈，如此感人，让它涌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成为我们社会持续前进的力量，成为对“捍卫正义、追求幸福、人心纯净、制度向善”永恒不变的赤诚。

最后，站在王佩英的纪念碑前，恰逢当前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刻，请允许我朗诵著名诗人词作家葛根塔娜的一首歌词，献给其事迹和精神深深滴入我心底的王佩英烈士，献给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英雄们：

千年的迷雾 深锁长路
生死向前途 慷慨奔赴
只是那一刻 诀别时刻
风起瑟瑟

且把我的梦 葬在黎明
沉睡的黑夜 才会苏醒
永远不要问 去年今生
只见大雪纷纷

手足同盟 血洒从容
但愿这一片殷红
也能感动
我们后 千万众

手足同盟 我心从容
但愿这一去苍茫
爱的微光
在身后 让人间 照亮天堂

谢谢大家！

~~~~~  
【自由论坛】

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 秦 晖 •

〔本文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人社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上的讲座文字记录。未经秦晖教授审阅，纯粹是私人记录。〕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交流。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屏幕上的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今天只会想到哪里讲哪里。之后的互动大家再提问。

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既被赞扬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们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以否定文革开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识基本破裂（见《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我认为，其实改革是关于“走出哪里”的共识，“走向哪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共识。至于走出文革，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东欧的改革很不一样。

改革初年，当局就否定文革讲了好多话。但是他们发现，按照他们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就当作历史上没有这事。民间对文革的印象，则是当年否定的镜像。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和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变成以下四种观点、两个逻辑的描述。

一，体制内肯定。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

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二，体制内否定。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观点略微偏向于党内民主派，至少在他复出后的早期。他对文革的反省，还是比较早的。邓小平认为，文革是几乎断送我党江山的鲁莽之举。陈云也是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了好感。基本他们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来邓退回去了。不过即使是邓，认识上的基本格局也没变。他认为文革最大的悲剧就是冲击了“走资派”。这种观点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全部归

结于毛的多疑和胡闹。归结起来，这一派对文革的主要认识就是：文革就是反当权派。

显然，他们对文革后期当权者迫害群众、造反派的行为闭口不谈，甚至持肯定态度。邓和陈云的最大区别是：邓认为整个文革期间活跃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陈对“八旗子弟”（既现在的太子党——陈注）非常有好感。这些贵族红卫兵，专整黑五类等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人的累累罪行，但社会对这些从来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在中国活跃，我在此也就不点他们名字了。邓小平对这些人没好感，主要还是因为邓刘（少奇）两家的后代，大部分没有和他们一道取得政治优势，也就是没赶上趟。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据。不可否认，文革时期的确有比较变态的言论自由。不过这种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墙之后就被明令取缔了。邓号称取缔这种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点。同时废除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以来的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其实本来这些权利也一直没有，不过在文革期间，毛需要实现混乱的局面（从而达到打击走资派的目的——陈注），于是只要在毛划的一些禁区之外，冲击地方当局的抗争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这种观点的延伸，就是对旧有意识形态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厌烦。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所谓太子党纲领。他们宣称，我们国家是有执政者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当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放纵人民。很吊诡的时，这种庸俗的，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张，竟然从反面使群众对文革那种自由打击当权派的美好景象产生了想象。

当然，当局察觉了这一点。于是越来越趋向于回避文革这个话题。肯定文革也不合适，批判文革也带来困扰，不如不要提。

三，反体制肯定。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色红卫兵。而杨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

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着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等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四，反体制否定。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干部，不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体制，即前十七年。这点与刘国凯有类似。胡（耀邦）赵（紫阳）也有类似。他们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这点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邓与胡赵分手了。更恰当地说，是胡赵在中国大分裂中脱离体制。他们最严重的对立面是体制类肯定（毛派观点）。他们更强调

文革的意识形态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为腐朽。和陈云对立。他们和杨刘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肯定，但是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的抗争，而非从民主进步的观点。他们认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说近代持不同政见运动。更像是农民造反。他们反对把造反派和新启蒙运动挂钩。

四种观点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趋势，总的是体制性的否定越来越向典型化发展，但越来越说不出口，越来越脱离现实要求。在文革中，邓失势比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长的一系列势力都看作是捣蛋分子。邓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乡广西是造反派从来没有掌权的地方。当权派在文革中后期对造反派的镇压也特别厉害。八四年前后，邓松了口，处理问题，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现在在广西已经成为禁区。

全国而言，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他们很多人参与过文革初期的对群众的镇压。邓实际上反对启用这些人。而这些人本来在邓江时代也没什么活动空间。但是陈云是这些人的总后台，陈认为：“我们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经济战略上，陈云主张彻底失势。陈主张计划经济，但也是反毛的，因为毛也不搞计划经济，毛就是胡闹经济。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人事组织，九二年之后随着邓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别是出身于与造反派对峙的保皇派，大量从政。陈云留过苏，陈云反毛并不是因为毛搞斯大林式经济，而是毛胡来，搞乱了斯大林式的经济。赵的回忆录中，对陈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贡献给予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总后台实际上是陈。而邓在文革后复出比陈慢。邓在改革开始并没有对文革放炮。赵提到，陈在骨子里非常亲苏，他认为苏的计划搞得非常好。他认为陈反毛包括对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满意：联美反苏。陈认为苏联怎么着也是社会主义国际。和苏再怎么闹也不应对立。陈站在苏的立场上，这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改革的不同点。我们要看到，中国非毛化一开始就是两种势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

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

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

罗列极权国家的整人几种手段：如对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肃；对群众，用反右。从中我们看到，发动群众整当权派是非常罕见的手法。我反对纯粹用毛的理想主义解释文革。毛是个理想派确实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运动用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比如，在经验统计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地权的地方，比如老苏区。如果单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法解释。

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把刘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主义，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减少了。

我认为七千人大会是毛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从来没遇到的被周围一致抵触的情况。用江青的话说，毛当时是憋着一口气的。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

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

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确实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

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的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但是这两股势力最终还是要分家的。我们看到，八十年代，邓和胡赵本来企图调和这两股势力，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扬镳了。邓站陈云这边，赵站民主派这边。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毛的这些创造，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法家的法术势。毛自己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年毛还搞群众运动，评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当年的号召下才读韩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时毛培养的。你看了韩非子你就知道，韩非子确实是集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媲美韩非子的权术著作。我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性有高调的预期。但我认为毛对人性就完全没有信心。但你很难说毛是个彻底的政治流氓，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格的。但是很难去定位，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流氓之间，有很广阔的空间。

可以发现，毛宁可牺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选择智力高点。比如，当年反右时号称的阳谋论，他宣称这些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么一说，他不完全就是个政治流氓吗？但毛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认为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他一开始的确是真心希望群众给党提意见的，也就是说，毛没有他自己讲的这么坏。但他不知道这样讲对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坏吗？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智力上的怀疑。斯大林在《君王论》上有这么一条批示：“令人恐惧比受人爱

戴更伟大。”我认为韩非子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概念，毛的政治逻辑也是这样。

我不否认毛的理想主义因素，但这对于历史来说，太不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

【口述历史】

几度风雨几度秋（中）

• 李冬民口述 • 阎阳生、米鹤都采写、编辑 •

（续 z k 1 2 0 1 b）

◇ 用《宪法》维权

这期间父母也自顾不暇了，交流更少了。我回家后有满腔热情的时候，也有苦闷的时候。这天晚上闷得慌，我就到侯子贞家去了。侯子贞是我们25中品学兼优、循规蹈矩的学生。他可以说是全校的头号优等生，每年都得个优良奖章，连续三年叫金质奖章。学校还准备发展他入党。他父亲是外贸部的一个干部，对孩子管得很细，也跟孩子交流。我去他家也很随便，和他父亲也聊天。他父亲还看了并称赞过我写的那篇《论间谍》。

那天，我在他父亲的学习材料中，无意中抄起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一翻呢，有个第三章第八十七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之自由。

我是想到就干的人。第二天一早，我就带人去跟工作组要油印机。工作组有个姓张的年轻人，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说不行。他说，你们印传单出了事谁负责？我说不是传单，我们就是一篇文章，一个呼吁书。他说，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拍着胸脯说，当然我自己负责，国家也规定，言论自由，文责自负。他问，谁说的？我“蹭”地就把兜里揣的宪法掏出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八十七条。他是检察院出来的，当时脸变得铁青，说：好，你负责，你拿去吧！

从这以后，工作组就开始让一帮初中学生盯我的梢，开始整我。我们学校第一批的老红卫兵都是一些高干子弟，那个时候积极跟着工作组整人。从此，他们就开始把我当成敌人，拿我当反对派，当成政治斗争的练习品，还拿着木枪，准备对我搞围攻。我就在黑板上写出毛主席的《咏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我们搞的并不是跟谁争领导权。我说，这简直是苏联、东欧修正主义围攻中国共产党的布加勒斯特会议！

工作组除了批我，还说我们班的曲折同学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曲折呢，家里是希望让他上大学，他那时就想要上山下乡。文革前，也宣传了很多这样的知识青年典型，如邢燕子等。曲折就一门心思想下乡，他要去当邢燕子。他就给家长念毛主席语录：“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要上山下乡。他父亲是个裁缝，也用毛主席语录反驳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所以你要上大学，好好学习。有些同学就把这些生动的对话搬出来，说这是曲折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

◇ 小“三反分子”

我们跟工作组的矛盾，比清华附中还典型。城里的这些学校，工作组要蛮横得多，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党，党就是一切。6月20号左右，他们策划了一个大会，叫全校文革辩论大会，而且还请了外校的领导观摩。

大会从早晨8点开始，大会由校文革的头头主持，工作组在下边坐镇。让我、侯子贞和另一班的团支部书记臧振彪站在前面，那次二中的刘龙江本来是来观摩的，后来也给陪绑了。我们在台上站着，前边有一排桌子。底下的人喊，低头啊！我没低头。中午吃完饭接着开，吃完晚饭再接着开。我中间的饭是怎么吃的，都忘了。为了表示不完全是冲我们这几个学生来的，他们也把一些“反动老师”也拉来一起批斗。那时还不兴打人，下面扔个石头什么的，他们都制止了，我们还没有受皮肉之苦。此后学校里斗老师，就有挨打的了。

这个会从早晨开到了晚上，全校三千人没有人敢不到场。当时，在礼堂前边操场，黑压压的。也有人困，也有人睡觉，叫醒了接着开，然后又从晚上开到第二天早上8点，太阳出来，整整24小时。

大会名义上是大辩论，实际就是批斗了。所谓的辩论，基本上是说一些事实。那些事实，今天听了很可笑。他们说我们是“三反”，第一条反党。控诉我怎么跟工作组对着干，证据就是那个油印机的事。这个反党就很清楚了，我是跑不掉了。侯子贞呢，说他发牢骚吃不饱饭，农村里的农民更苦更吃不饱。这是反社会主义。臧振彪也有点什么，这样就给我们凑齐了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这次批判会之后，工作组宣布我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定成“反动学生”。我想，是不是“反动学生”的词分量轻了，另外有点像当年国民党说共产党学生用的词。

当时，工作组整我们非常地认真。他们把工作组人员派下去，分化瓦解学生。先分化瓦解我们班，以我们以往在同学中的威望、学习成绩，别人不敢反对。这时也出现了几个见利忘义的，跟着工作组收集我们的证据。然后，把我的班文革主任换了别人。不过，工作组也没有再找我个别谈过话，但勒令我们天天准时来学校报到，晚上还可以回家。

这段时间就天天在班里开会学习。到了7月29号，毛主席从南方回来，在人大大会堂开会。主席那次说，让少数人也发表意见嘛，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将来如果真要写红卫兵历史，如果不反映文革的这个情节，就等于没把文革最激动的情景写出来。什么毛主席畅游长江啊，跟大伙没关系，跟我们命运相关的是，毛主席说，让少数也说话嘛。然后把刘少奇搁一边，让他承认错了，把工作组撤回去了。

我和工作组叫阵，想想真是不自量力，不过最后结果是工作组落荒而逃，这就要念毛主席的好了。

◇ 红色恐怖

红卫兵闹得风起云涌，始自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发达，从海淀到城里骑自行车得骑一个多钟头。但就这点距离，清华附中那个造反精神移到市里来，就完全变样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是跟工作组对着干，城里的红卫兵是支持工作组，而且帮着工作组整同学的。像我们25中的红卫兵，跟工作组亲得不得了，整天给工作组打洗脸水。我们学校老红卫兵就是这么成立的，很没出息，给工作组当服务员，从形象上就跟红卫兵的称谓不协调。

过了没多久工作组就倒台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转眼就翻脸了，他们勒令工作组滚蛋。贴上标语：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出去！这帮孩子愣是把工作组的脸盆、被子往外扔。工作组撤走以后，我们学校这些老红卫兵权力更大了。

他们跟工作组虽然跟错了，但他们又拿起了“血统论”作为武器。我最烦老红卫兵的，第一个是跟工作组，第二个就是血统论。他们在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重要关头，都错了。

工作组撤走以后，我就自由点了，但是他们听说我们高兴了，就马上捡起血统论做武器，表示他们是红卫兵，可以独掌生杀大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次班里开会，一位工人出身的同学秦喜昌提到工作组整学生，说：我越想越是工作组错了，不是我们错了。李冬民、曲折都是好学生，李冬民学毛选比谁下的功夫都大，都是很自觉的，还真不是假积极的学生。秦喜昌那天很激动：说李冬民他们是反革命，我不服，是工作组做错了。教室里哄的一下就引爆了，大家议论纷纷。那几个紧跟工作组的学生镇不住，就找在校文革掌权的老红卫兵，他们来了几个人，这时候他们新的棍子就是血统论。他们不直接冲我来，也不冲秦喜昌去，进来就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挨个问“你什么出身？！”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出身不好，他当时说，我父亲解放前是铁路上的职员，是不是官就知道了。他给自己“上纲”，说，给国民党干的就是伪职员，伪的呢就是反动的。那我老子反动呢，我就是混蛋。这学生接着就当全班的面开始检讨，很痛苦。另外一个当过校团委总支委员的同学，也因为出身不好，一帮人过来问，你什么出身，上去就踩他的手。他们就想用这种低劣的手法把我压制住。

这些老红卫兵接着更错，上街去打流氓、剪飞机头、剪阿飞裤。简直就把革命给你形象化了，从抽象思维转到这具体形式，就是打流氓、破四旧。后来，我们又辩论过一次，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社会上，开始去打人、抄家。那时也不知道从哪儿抓来的人，拉到学校里打。在学校也把一些学生打成了“反动学生”。我们没有打人，也没有权力打。那时候我们自己反革命帽子还没摘掉呢，闹不好还会挨打。但当时我也没有觉悟到打人完全不对，认为要真是反革命分子，可以打，如果是抓住证据，比如抓住了特务，是可以打的。那时候我的觉悟是介于可以打和不能打二者之间。

“八一八”的时候，我没有参加，而是躲在二中一个同学家里。他家有电视，所以会场的电视转播我看到了。毛主席接见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上去了。我觉得毛主席支持错人了。而且我并不喜欢红卫兵这个名字。“红”还可以理解，“卫”就有点不独立，依附，没点儿自己的思想。“兵”字我是没想过，但是不大气。但“八一八”下来，“红卫兵”的名字就改不了了。而且弄了个造反歌，不知谁写的？真难听，太低级了，我就觉得非常俗。只有中学生才能做出这么可笑的歌词。不过，动乱的年代，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成为暴民的口号和纲领。

8月份，整个北京的打人风就刮起来了。清华附中的造反精神是理论上的思维，到了城里整个是市民暴虐思想对市民阶层的迫害。开头，先是二中的老红卫兵大打出手，踹出了第一脚，这就撕破了这种道德和纪律上的约束，见血就光荣。我看我家附近女十三中有的那个小女生，刚打完所谓的地主资本家，那军用帆布皮带上都是血迹，就系在她们腰上。城里的红卫兵都是这样的，酿成了红色恐怖。当时我觉得，这是一帮暴徒。面对他们那种群情亢奋，我真实的念头是，红色小纳粹。

我同学的妹妹在女13中，她们有天在一起说那时候学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比如像“他妈的”。她们就要从语言上、从风格上开始探讨革命，说“他妈的”是革命的口头语。这些挺可爱、才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装模作样的，这个“妈的”，那个“操”的，连怎么骂都骂不利落，

但是还要骂。

操着这样的语言，再拿着皮带打人，整个一帮红色小纳粹。当然也没想到我以后居然也成了“红色纳粹”头目了。

◇ 创建首都兵团

“八一八”我没赶上，但那以后我又开始恢复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秉性。我也不来学校了，有时间就上清华啊，北大啊，看大字报，也看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个“三论”什么的。后来，我想，人家都有组织，我没组织不行，就出现了拉山头的想法。到9月份，我觉得我们应该革命了，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了。

我父亲这时候其实已经被打倒了，我属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这时候臧振彪也缓过劲来了，被工作组批斗迫害的精神状况恢复过来，不那么萎靡不振了。我说，你父亲是革命烈士，出身没问题，也没人盯住你。我说咱们也成立个组织吧，最初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宣言这种革命性的文件都是我起草的，我们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言》在25中贴出来，就占房子。只要是公共的房子，贴上条就是我们的了。

我们的宣言就批判老红卫兵的不良行为，根据我们自身的特点，表示和我们学校老红卫兵划清界限。在组织上，这个工农兵、革干、革军这些“红五类”出身的，有资格参加，同时非红五类出身，表现好的，也可以加入。就这么一条，宣言贴出来以后，我们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马上就门庭若市，效应非常明显。我们就这样成立了组织，臧振彪他们在学校就活跃了。

我呢，有更大的使命，出去到外校串联去了。我还是以教育革命的内容，串联二中和景山学校。景山学校过去在教育改革方面，是最早的实验学校，他们不仅学外语，还用外语原著讲数理化。这是我推崇的学习方法。我先和景山学校联系上，9月初，我们就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开了一个会，串联了十几所学校名称是以“毛泽东”开头的红卫兵组织。原来我们叫毛泽东主义，听说毛主席不同意称自己为“主义”，我们就改叫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这样，我一直在校外串联张罗着。1966年9月16日，我们就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成立大会。有十来所中学的近千人参加。我读了宣言，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记得当时有一位《解放军报》的记者，来会场采访，他询问了大会的宗旨、议题、负责人等情况。他后来成了《解放军报》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我们成立时，和中央文革没有联系，我们还没“巴结”上呢。首都兵团不像老红卫兵，从家庭关系就和中央有天然的联系，但是，首都兵团大部分的骨干学校都是城里的学生，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中央的决策机关。

首都兵团司令部当时找到两个民主党派的办公楼，一个是民主促进会，一个是隔壁的农工民主党。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不是我们封的门，是当初8中红卫兵干的事。我们找到这里，就把它启封了。它离我们学校近，地方也够大，又有房子，又有摩托车，又有汽车。启封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两个办公楼占用了。我们后来又占了致公党中央机关，在那里办起了报纸。接着就占到了全国工商联，那儿也有我们的办公室。那时是占山为王，谁先占就是谁的。我在红卫兵运动中算是个人物，但是个比较温和的人物，也就是说比较讲秩序还讲政策。现在回想起来，可以总结的是，我算是走中间路线的。因为我们态度和蔼，既不骂人也不打人，不像前面那些老红卫兵，对他们来讲有安全感。这几个民主党派，一看我们还真是仁义之师，像是解放军的形象吧，仁义的红卫兵。所以他们还挺欢迎，说来了一帮讲政策的红卫兵。而且从此以后，再

有哪家红卫兵去了，他们就往外推，说：我们这儿已经被首都兵团占了。对，共军已经占了，国军就不要来了。

我们在北京市区占了几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地方，办了《兵团战报》，这是文的方面。在武的方面，那时候就是跟老红卫兵的东纠、西纠学习，拉一帮小孩子成立红卫兵纠察队。这帮孩子呢，都是各学校的，也是到处占地方。一个在学校占，一个在校外占。我就觉得这正是扩张的时候，光纠察队我们就建了7支。从1966年11月到12月份，这两个月里，我们的组织部长秦喜昌，靠勤奋的两条腿，坐公共汽车，坐长途车，在北京18个区县都建了联络站，建了“首都兵团”的支队。

后来，我们把一些封存的汽车也给接收了，还有体育学校的摩托车。那时候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快。中学生正年轻，开摩托那么刺激，能不开嘛！我喜欢摩托车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开始根本不会开，也根本没有驾驶本。我记得我第一次开摩托车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挂档，打着了以后，挂一档就开着走。半夜三更的，整个街上就它哒哒的巨响，就那么开着走了一路。还有一次，车还挂着档，也不知道怎么就打着了，那摩托车噌的一下就蹿出去了，想想挺危险的。刘龙江开摩托车的时候，摩托车一下挂二档，一条新裤子的裤腿整个被撕下来了。那时候摩托车都骑疯了，变成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了。

◇ 总部的小政变

当时在兵团内部，也有点分歧，分歧还是在对血统论的认识上。我们其实都反对对联，但龙江和另外几个人一边反对联，一边也心有余悸。

我爹原来是老区的，干部调动到北京来的，40岁的时候当了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1966年文革运动一开始就整北京市委，他当办公室主任得罪人也比较多，很快就给打倒了。因为老区来的，他们找不着他特务嫌疑，他过去也没机会进监狱，当不了叛徒，就打成了修正主义的黑线人物了。我自己当然知道我父亲不是坏人。可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暗下知道我父亲倒了，说你父亲也黑了，你也就长不了了。

那次是66年10月份的事了，我们既然成立了组织，也得有活动啊。你建了这个庙，就得要烧香啊。我们就召开了一个革命性不强、但有社会公益的，欢迎中国石油1211英雄钻井队的大会。我们租了个会场，搞了一个向英雄致敬，向毛主席致敬的一个会。

后来我听说，那个万人大会，我穿一身蓝衣服，戴一红袖章，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那几个负责人嫌我太扎眼了。他们就指使人，给我写了一个条儿，说：你不要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影响不好。他们怕人家抓我这个黑帮子女的小辫子。

接着，他们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派人到二轻局去调查了我父亲的问题，开始排斥我了。因为这些事，我把另一个首都兵团元老秦喜昌调到兵团总部，就去黑龙江串联了。结果我到东北不久，首都兵团的内部矛盾就爆发了，一直延续到12月，我就赶回来了。

那时，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也腐败了点，不懂事，出门就爱坐个车，前呼后拥的，还有女秘书。秦喜昌是个绝对清廉的平民子弟，眼里不揉沙子，干事拼命，痛快利索。他去了立马对兵团这些非革命化作风进行各种抵制，而且他明着为我鸣不平，说我是学毛著积极分子，而且落实在教育革命上。后来，他坚定地为我主持正义，最后决定采取具体行动。

秦喜昌那次带人包围了兵团司令部，他到会议室说：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这事不

能说是我策划的，应该是我们大伙商量的，最后我也同意了。我们没有要打的架势，但是说得很明确。秦喜昌很文明，让他们走了就完了。这就是小政变。不过不是夺别人的权，是别人先把我排挤走了。事实证明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错了，于是我们就做了个决定，从路线上要清理他们。清理完了以后呢，就让他们出去了。

◇ 靠上中央文革

有一次，因为兵团下面的人惹了点事，关锋、戚本禹找到了我们首都兵团。他们到我们这里了解以后呢，就向中央文革报告，说刚刚发现北京中学生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机构，这么成系统的一个组织。这时正好老红卫兵垮台了，其他各派还没有成势的青黄不接的时候，而我们就显得地位很重要了。

1966年12月11号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去人大大会堂开座谈会。我们这一群人谁都没见过中央领导，乱哄哄的。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群人，有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往下是张春桥、姚文元、谢镗忠、李曼村，穆欣，还有军队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中央文革都是一身军装，江青也穿军装。只有总理穿一身灰衣服，康生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

那次是我和中央文革的第一次见面。你想想那个场面！被称之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除了主席和林副主席，其他人都来了。那么大一个阵容接见的对象，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帮小孩子。据记载我们去了19个人，我叫大家都坐下。中央文革也10多个人，还有总理。他们在中学发现了这么一批新人，很好奇。当时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谈得也比较轻松。

寒暄完了以后，他们就了解中学的这个形势，了解全市18个区县的中学和我们的组织情况。当时有我，刘龙江，还有臧振彪等，我们这19个人是代表全市18个区县的。我们没有发言次序，大家都说了几句，我不记得了，可能我说的多一点。那次会上，他们问的问题，是想了解中学里的一些情况，接着就是听听我们兵团的情况。

当时大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是工作组问题，工作组打击学生算一个问题吧；再一个，就是搞红色恐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在这时候已经变了味了。我们是把血统论制造的红色恐怖这些错误，称之为文革当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老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已经垮了，但是理论上还没清算呢，大家还在告状。

当时我们正筹备一个会，就是批判老红卫兵用血统论制造红色恐怖，控诉中学里打人、伤人、害人的这些劣迹。这个会呢，定在12月16号，会场定在工人体育馆。和中央文革见面以后，我就正式邀请他们参加12月16号的大会。总理、江青当场就答应了。

12月16号首都兵团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中央文革也是全体到场，这就把过去说的所谓出身问题的阴影一扫而光。

◇ 江青为我更名

1966年12月11号在人大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我们首都兵团，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

当我招呼大家都坐下后，江青这时候就假装熟悉似地看了看我，问：哎，你是谁家的孩子？江青可能还想套用以前和老红卫兵打交道的方式，因为她对这些高干子弟家庭都熟悉。但是我们这里不一样了，按我父母这个官对她而言也就是老百姓家庭。

我坐下跟她说：首长，您以前没见过我。江青就挺好奇，她问：那为什么？我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没见过您啊。康生和戚本禹两个人觉得我答得挺有意思，笑了，江青也一笑。她一笑我就给她加了一句：因为您是首长，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我们大家都想见到您。您呢，见过的人比较多，不一定记得住。但我们见没见过您，我们印象会很深刻的。这是我见江青的第一面。

这次见面不像光明日报的记者后来在书里写的那样。在文革结束10周年的时候，这位记者曾问过我这次交往的情况。他后来写到：江青见到我的时候，还讨好似地问我，你是谁家孩子？文中写道：李冬民非常有立场，非常冷静地驳斥江青：我没见过你。那意思好像是说我当时对江青不屑一顾，所以对江青说：我没见过你。这个细节他记载得不对，我那时对江青非常尊敬，细节应当是我上面说的这样。

我和他们接触，我感觉我比较自然。既然说事嘛，和大人说事，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的也都是具体的事件和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他们也在听，当时我也很坦然。

后来我们的活动都是对中央文革负责，直接接洽的是戚本禹、张根成。在上面对江青负责，但不陈伯达负责。我们那时候都有点大人气了，而且我不是那种高干子弟，所以没叫过“江青阿姨”，而叫“江青同志”。不过江青倒是给我改过名字。我叫李冬民，有时候也用“李东民”三个字，在一开始的宣言啊，《团结大多数》等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李东民”。一些小报也用我这个名字，我开始的组织也叫东风战斗队，一是象征着咱们东方民族主义的色彩，又是共产党的革命色彩。东风总代表共产党嘛，有革命意义。当然最主要还是代表毛泽东，这种领袖的身份。

江青看我有时候用冬天的冬，有时候用东方的东。1967年春夏之交，有一次见面，她就说：你就把名字就改成“东方”的“东”吧。这样呢，这个“东民”是上跟毛泽东，下联系人民群众。江青还有这么一个解释。

后来我的名字就改成“东民”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像文革初期时的改名风潮，有点俗套，所以也就是在发表文章时用，我有几篇文章是用这个名字发的。户口本上没改过来，一直是冬天的“冬”。

从1966年底到1968年，和江青在会议上接触的次数比较多。最后一次见她是在1968年的五一节，是在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当时最荣耀的是总理啊，也把老师们请出来了。那时候像朱德，陈毅等那些老师、老领导好久没在公众场合出现了。而中央文革的有些人，像关锋、戚本禹已经不见了。那次印象很深是对于老师们的位置安排，从位置上也是在右边儿上，可能是中央文革做的这种安排。那时跟江青已经好长时间不见了。吃饭的时候，我们上去给她敬酒。那次江青表现出来，还把我当孩子似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你长高了。我就问问她身体怎么样，她说很好。那一次她没有穿军装，是一身灰色的西装，有件灰色的披风。江青的形象还是可以称之为婷婷玉立的一个人，很有风度，言谈举止很潇洒，很自如，谈笑风生。她对我很亲切，那个时候像个女人看孩子似的。那也是最后一次，我们也从此就再也没见过。

◇ 总理不把我当孩子看

文革中，我们和上海的一月夺权不谋而合，也在一月占了北京市委大楼。1967年1月，我在北京市总工会参加了两次会议，是由北京工人造反派一个头头召开的。他们认为，李雪峰在当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实际上也犯了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他跟着刘少奇改组了彭真的旧市委以后，给各地派工作组，等于在路线上也错了。

这些工人农民比较务实，他们不往上看，就瞄上了北京市委，认为新市委也错了，一直还没清算呢。工人农民啊，就在这两个晚上开会讨论这事。一个是市委有哪些罪状，一个就是调兵遣将，准备要占北京市委大楼。那两次会上，大学生只有韩爱晶一个，他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很瘦，穿一身棉的黄色短大衣，实际上是他们北航的工作服。等到研究占领北京市委大楼的时候，只剩下韩爱晶跟我们讨论这件事，但他也调不来人。那时候城里的中学生就有个好处，人多、交通便利啊。第二天下午我们打几个电话，呼啦一下来了几百人，好像600人。以后第一机床厂又找了些工人，就这样把北京市委大楼给占了。

当时我也去了，在里面待了两天。二楼是机要室、电话室，有小会议室、小礼堂，就动用几个学生看管住。我们去了三楼，三楼是核心部门。后来北京成立了革委会后，三楼是领导办公的地方。中学生对这些知道的不太多，也不懂这个机要那个档案的，所以都没碰。这时候，接了一个电话，中央文革通知我开会：去听上海一月风暴的经验宣讲。那时候中央文革已经知道首都兵团了，也有电话了，有这种会一般都通知我。

这样我就去了人大会堂三楼的小礼堂。开会应该是晚上7点半，那时我也不知道忙乎什么，到那儿已经9点了。那天晚上挺热闹，那些上海的工人代表正在讲，之后才知道是王洪文。他们介绍“上海公社”，介绍一月风暴的夺权经验。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这些人都在台上。我急急忙忙地到最后边，要了张纸写了个条子。给总理和江青写的，当时我就认他们俩。我写：“周总理、江青同志，昨天晚上，北京的革命群众已经进驻北京市委大楼，造了北京新市委的反，夺了北京新市委的权。”最后写上我的名字。

那时总理正主持会呢。一会儿他就说：请李冬民同志上来。我赶紧从后面跑上去了。总理说：你来给报告一下情况。我就现场报告了一番，说我们多少工人，多少学生，怎么把整个北京市委大楼占了。当时正在讲上海夺权，我这么一个报告挺呼应的，也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东西。

我讲完下来，总理就专门走下台，对我说：你去打电话，告诉这些革命群众，我们支持你们夺权。进去了就要坚持住，不要再出来，要抓好全市的生产，管好人民的生活。后来我也挺奇怪，北京市委被占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有人往上反映。外界还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偏偏就是我去报告这些事。而且总理还让我去打电话传达他的指示。我也像个大人似的，跟他的秘书一样，赶快去通知传达。

我经过这一次和总理的接触，就觉得很随便了。像他这个年龄的人，能够不像家长和长辈那么和我谈话，在我接触的人中，总理是最早的。我感到他比较和蔼，而且他喜欢听具体的事情，我跟他交谈，说的都是具体的事情。

还有一次，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开什么座谈会的时候。我就告诉总理，北京饭店的两派要打架，一派要封门，一派要找外边的造反派冲进来。这些造反派都是已经工作的职工。因为我一直关注各种社会问题，所以消息比较灵通。我得知这情况后就告诉总理了。

总理听完我说的，特别认真。他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外事单位不能乱！这是北京饭店，是北京进行外事活动的地方，不能叫造反派进来，更不能封门。然后他马上对我说，你去给他们打电话，不要封门。我说：好，我马上去。他一边讲一边让服务员去给我找电话，把我领到小礼堂后面，让我打电话传达他的指示。

总理跟我交谈的时候，做特别安排的时候，从不把我当成一个中学生，而拿我当个可以依靠的人。你给他讲这个事儿，他就委托你办这件事。总理没拿我当个小孩子，这是第二次。

◇ 吃面条谈“三结合”

1966年底前后，兵团里有一个景山学校的女生被人报复打了。江青听了很气愤，就指派谢富治查办这事。当时我在场，跟谢富治就是在这个场合认识的。谢当时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负责抓人查案子的是谢富治。这事最后也没查到，但是谢富治很认真。

此后一个时期，组织这种大、中学生座谈会时候，都由谢富治出面。我们见了多次，也比较熟悉了。而且他对首都兵团呢，应该说比对别的学生组织更熟悉一点。

1967年1月，具体哪天我不记得了，谢富治单独找我。他打电话把我叫到大会堂，我到那已经是晚上11点了，从南门进了江西厅。在小厅里，只见谢富治正弄着一碗面条，在那儿吃。我说，谢副总理，您还没吃饭呢。他说没关系，你坐下谈。又问我吃饭了没有？我也如实说：我也挺辛苦的，也没吃饭呢。他就让服务员也给我弄了一碗面条。清汤肉丝面，我对味道倒没感觉，解饿嘛，还是跟副总理单独吃饭。

我们边吃边谈。他说：是这么回事，毛主席现在有个意见，要北京市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是三结合的原则，第一，要有你们这些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第二，当然解放军要有一点；再有呢，就是这些地方干部，也参加进来。这就是三结合。

他说：你看我们北京也成立这么个权力机构，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他问，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他说那我们就按这个三结合的原则，你们革命小将准备着，按这个原则去把自己的组织建起来。作为一个方面，作为这个权力机构的支柱。他也没说我是头儿，也没有提具体的名单，但是当时中学生里，他就找了我一个人。对于我来说这是最早的一个通知。

接着，谢富治有次召集工作会议的时候谈北京的运动形势，捎带着讲准备组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机构。他说，有这么一个原则，通知你们一下。党中央和主席指示我和戚本禹两个人，抓北京市的权力机构建设。我们给你们当联络员，给你们做服务。再往后，就是在2、3月份，正式通知我：大学组织了个红卫兵代表大会，然后你们中学呢，因为人多，再单独组织一个。当时北京的大学几十所学校，大约有16万人。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是500多所，大概有50多万人。

江青在多种场合下，表扬过谢富治。她说谢富治同志是个好人，多次说到他是好人。谢富治总是很憨厚的，喜不自禁地笑笑，发出那种非常欣喜的、呵呵的笑声。他对毛主席特别忠诚，然后就是办事可靠。谢富治对江青是言听计从，看得出他们的关系很好。

◇ 筹建中学红代会

谢富治和我谈过之后，就没再找我，而是中央文革和我具体谈。筹备中学红代会的运作体系大致是这样的，上面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牵线，具体联系是张根成，他们负责提出指导意见。负责组织工作的是卫戍区负责军训的李钟奇，具体办事的是防化处的处长刘丰。他非常精干，做事也细致，跟我个人感情也很好。我们经常一起到处跑。

文革中的北京中学生比较特殊，不像外地的中学生基本都是被大学生牵着鼻子走。北京的中学生一是政治上相对成熟，而且从八一八开始，实际是中学生在主导着北京的局面。二是人多，而且大部分都在城区，这是大学生没法比的。所以北京的中学生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这也是中央文革之所以那么重视，还专门接见我们的原因。这时候老红卫兵已经倒了，其他派别还

没有成气候。中央文革要具体联系中学的时候，除了我们找不到别人。首都兵团，一个是批判血统论，在这点上站住脚了。一个是搞毛主席号召的教育革命，虽然没吹起来但也有影响。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有个遍及北京城郊的组织系统。这样，一个是谢富治，一个是卫戍区，再就是中央文革，他们几头找，都是找到我们。

那个时期，革命左派就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一些中学生便投靠了他们。“三司”在下边也弄了个中学中专部，设在现在民革中央的地方。“三司”就此野心勃勃地想把北京的中学生都管起来。但是由于有首都兵团的存在，而且大学红卫兵还有“一司”、“二司”两派，这使他们未能得逞。作为我个人，认为“三司”太左，也从心里不喜欢“三司”把手伸到中学、想把我们也一统天下。可他们偏偏碰上了我这么一个人，我当时要是已经上了大学，北京可能就没有中学红代会了或者就是“三司”的傀儡。

筹备初期，中央文革找我提出了一些意见并点名推荐了几个人：首先，戚本禹建议把“三司”的中学中专部纳入红代会。第二，他确定了清华附中要有人参加，先找个代表人物，戚本禹让他的秘书张根成推荐了刘X，让我去联络。第三，红代会里光是学生不行啊，戚本禹又推荐了一个朝阳区的一个老师杨XX。第四，张根成又按照戚本禹的意见，推荐了101中学的任XX，说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开始筹备时，确实有三司中学部的人参加。我一看，什么三司中学中专部！我没有小算盘，但我很明智：你不能跟我们中学的首都兵团来对抗。后来，几个三司的人很明确地被我踢出去了。

中央文革推荐清华附中的刘X，看来也是蒯大富他们的意见。我先派人找了刘X。然后大冬天的自己跑到101中，在学生宿舍里找到任XX。这是戚本禹很欣赏的，极有口才的一个人。他瘦高个，声音洪亮，侃侃而谈。我再找了中央文革推荐的杨XX。另外我推荐了刘龙江。在筹备会之前，我们几个凑到一起，在宣武师范学校住了十天左右，搞集训。中央文革派来几个北师大的学生，类似辅导员，帮助我们工作。

接着又召集了各区县的人，这些人主要是秦喜昌提供的名单。说到这，不得不说几句秦喜昌。上学的时候，有一阵大家迷数学，一套数学竞赛辅导书有三千道题。他能没日没夜，一个人把三千道题全解一遍！他身体素质很一般，走路还外八字，而且家里条件差也没有什么体育投入，各种球类等活动都不会。后来他就找最省钱的办法，练长跑。他能够从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外八字，练到连续两年在全校运动会长跑比赛中夺魁，我们可是有3000名学生的男校啊！他就是那种不辞辛劳的拼命三郎。组建首都兵团的时候，他曾经跑遍了北京郊区。这次筹备成立红代会的时候，他又一个人下去跑。那时候我们也有车，大家都抢摩托车骑。他没有，就是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十八个区县他都跑遍了，奠定了红代会在区县的基础。

中央文革的张根成跟我说：你不能都弄成你们首都兵团的人啊。我说，对，面还得大一点。不过其他这些红代会的基础骨干，特别是区县的，别人提不出代表来呀，全是秦喜昌搜罗来的。所以，最后还是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为核心。

人选最后的审定，实际上是由卫戍区和下面的军训团负责。由他们几个人和我决定中学红代会的核心成员。最初根据中央文革的推荐，我们内定的核心组成员是5个。我一个、刘X一个、任XX一个、刘龙江一个、还有杨XX，一共5个人。（2）这个过程中，我和任、刘的关系都还是好的。对于这个机构将来怎么设置啊，也听他们意见。任跟我个人关系非常亲密，关系极好，他发誓要跟我并肩战斗。我也确实欣赏他有口才，他也承认我有组织能力，也知道工作组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这些事情。那时候我们编《兵团战报》，觉得他嘴行，我笔快，互相还是

挺欣赏的。

◇ 内定者落马

再往下一步走的时候，遇到麻烦了。我们成立一个全市性组织，下边还要听取学生意见。你这人物社会上有点影响，你还得在原来单位过得去才行。解放军是正规照章办事的人，下去一调查，发现问题了，中央文革点名推荐的3个人都有些问题。

朝阳区的那个中学老师，一调查说他有男女关系问题，这肯定不行。中央文革又介绍了一个地院附中的老师，叫薛玉峰，也很有才。他那会儿30多岁，跟我和刘龙江还嘻嘻哈哈的。

任XX呢，他在学校没有群众基础。很多人，包括和他一派的一些人也并不认可他。他的家庭呢，他爷爷在苏联，见过列宁，是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的成员。据说，后来俄罗斯还真承认他这段历史。按共产党的算法，他们家应该是老革命。当年不知道为什么，解放军外调的结果，说他家是伪官僚。也可能是说他爸，没说他爷爷。我其实挺喜欢他，但解放军不愿意惹这麻烦。结果在3月份要成立红代会的时候，把他拿下了。任得知这消息找我激动地长谈，他说我一定会跟你好好干。我没法说话，最后我说这个没办法改变，咱们以后还多合作。他非常气愤地离开了，日后他成为我的对立面——一个铁杆的“四·三派”。

刘X原来也内定是中学红代会的核心组成员，因为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吧。清华附中那些人，说她和蒯大富来往密切，老泡在清华大学里，整天不在学校。没有什么其它正当理由，就说她没有群众基础。她被替换不是我宣布的，而是清华附中军训团要换人。她也跟我翻脸了，后来也成了“四·三派”的干将。

我承受的这些，都无缘无故啊。最后凑了一个班子，一共37个委员吧。核心组就是5个。军训团外调后，把101的任XX换成了师大附中的陈永康。清华附中必须要有一个，于是换了一个工人出身的程金香。她是军训团推荐的，很老实一个人。核心组最后就是：我，二中的刘龙江，清华附中的程金香，师大附中的陈永康，教师代表是地院附中的薛玉峰。

在成立区一级红代会的时候，我还推荐过女4中的罗雪柯，她家是文联的吧，家里藏书巨多，这是我一直很羡慕的。实际上我们有点少男少女那种朦胧的情感。那些解放军看我对她挺认可的，让她当了朝阳区红代会的头。她后来成了女作家、影视创作者，后来嫁给了101中的鲍国路（后改名为柯云路）。大名鼎鼎的柯云路背后，应该说有不少罗雪柯的心血。

首都大学红代会首先成立，中学红代会紧随其后，是1967年3月25号在人大会堂成立的，当时除了主席和林彪，总理以下的都去了。开幕词是我写的，我读的。总理，陈伯达都讲话了。红代会的权力机构叫核心组，我是核心组组长。

中学红代会成立后，接着成立了工人代表大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这样革委会的四大支柱表面上就搭起来了。这四个会开完了以后呢，就在这四大支柱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9人主席团，谢富治为主任。军队上的是郑维山、付崇碧。地方干部是吴德，再往下呢，就是有一个学部（3）的人，还有就是四大支柱各出一个人，大学红代会是聂元梓，中学里是我，代表工人的是刘锡昌（音），代表农民的是邓万田（音）。我们9个人组成了主席团。

1967年4月20号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谢富治是主任，几个副主任有吴德、聂元梓、付崇碧、郑维山。中学生里只有我一个常委，其他的是委员。这个名单是中央文革决定的，当

然最后都是毛主席的意见。当年对我们的任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那时，我身为中学红代会的头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似的，也没什么权力意识。不过，代表着北京500多所中学，几十万中学生也觉得挺自豪。

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兵多得很哪”！我诚惶诚恐地赶紧对他老人家说：“我们都是您的兵！”

◇ “四·三”起烽烟

好景不长，随着中学生中思想认识的分歧以及中学红代会中的矛盾，中学很快分裂成两大派。

1967年初，军队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派出宣传队进驻中学，对学生军训，实际上是接管政权。接着，各学校成立了一批革委会。在军队派来干部的帮助下，东城区50多个学校，纷纷把革委会建立起来了。我们25中的军训团是铁道兵的，二中来的是工程兵的。

这时一部分不安分的学生，又开始活动了。大学里的一些人也与他们有联系，鼓动这些中学生冲击刚成立的学校革委会。这批后来成为“四·三派”的学生呢，就和来学校执行军训的解放军之间发生了矛盾，和学校里的“老兵”以及后来成为“四·四派”的学生都发生了矛盾。当初我们首都兵团批判对联的时候，他们中有些和我是朋友。在1966年9、10月份，我们这些后来的“四·四派”，认为对联不符合党的政策，自来红的思想是不对的。怎么老子英雄，儿子就一定是好汉呢？怎么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就一定不好呢？我当时的判断能力还是有的，再说就是自己弄不清楚，也不会去迫害别人，而且我们对出身不好的同学是有帮助的。但其中有些人到了1967年初的时候，就变得非常激进，反过来批判我，批判我们这些曾经帮过他们的人，说明确点就是要夺权。

这些学生闹起来，矛头首先是对着解放军的，因为在学校执掌大权的是军训团。他们逼着来军训的解放军，让人家表态支持他们。有的学校还把人家小战士逼到屋顶上，不表态就不让下来。这是极不合理的一些事。当时弄得很乱，他们就上访告状，并通过大学的一些渠道捅到了中央文革那里。

1967年4月3号晚上，红代会成立还没几天，正在有条不紊地做事的时候，我突然被叫到人民大会堂。我去了以后，先见到蒯大富，我问他开什么会啊？老蒯洋洋得意地说：你听听就知道了嘛。我到会场上一看，都是中学一些比较激进、不满意军训的人，其中有与老蒯关系密切的清华附中的，有27中的、28中的、6中的、地安门中学等学校的一些人。一会儿，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戚本禹，应该也有陈伯达，就都到了。还有负责军训的解放军也去了。

学生和解放军坐在下边。一开会，这些学生就开始控诉军训的解放军，批判军训团，说解放军支持“联动”，是反动的啊，不支持他们革命派。他们在会上说的话，有些是很极端的，不符合事实的。

有学生说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有个首长还说什么什么了。他们一告状，江青很激动，问：是哪位首长啊？有学生说是周依冰。当时北京各区军训有个联合指挥部。东城区负责军训的是65军的参谋长周依冰，就是后来“六·四”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当时江青情绪来了，用手一指，问：谁是周依冰呀，站起来我看看。周依冰当时也坐在下边，他长的还比较魁梧吧，穿一身绿军装。被江青叫起来很狼狈啊，当众羞辱，站起来搭拉着脑袋，什么也没说。

会上江青很激动，说：我们几天没有关注北京，北京就出了鬼啦，就闹了鬼啦！闹鬼，就是妖魔鬼怪的鬼！她真的很激动，说，这个事情，是解放军的立场问题。你们解放军军训的领导呢，要好好地听取同学们意见，改正错误。我们有些问题，还可以坐下来一起谈。但她很明确，是要让解放军改正错误。

江青后来可能也觉得自己有点儿过，说了一大通后，江青最后又加上几句：我今天的话，是我们自己人关起门来说的话。她也明确要求：你们不要弄成中央首长讲话，不要散布到街上去。

这个会是中央文革组织的，只通知了中学里这部分激进的学生，叫我去是因为我有个中学红代会头头儿的身份，他不叫我不合适。（4）但是从程序上，既然有红代会，你首先应该是通过我了解情况，然后再开会才合适。我觉得，这里面起主导作用的，实际是中央文革在各大学的那帮联络员和三司为首的一些大学生。他们不满意中学里的权力格局，更不满意军训团支持保守派、压制激进派的立场，于是搜集情况，串联找来这些学校的激进派，向中央文革告状。事后分析，一是三司他们把中央文革给套进来了；一是中央文革自己需要这么个形势。因为上面有二月逆流嘛，下面中学也有逆流，他要打击打击。

会议是中央文革和学生座谈的形式，一个个举手，随便站起来发言，但一看都是事先组织好的。

当时康生也说了话。他说：同学们这些发言呢，让我们感到北京情况有些不对头。前几天，我批评过李钟奇同志。李钟奇和一些联动分子谈话时说：你们的父母都为革命立过功劳。这是给这些联动分子鼓气，是不对的，所以现在造成中学出这些问题。

会开了4个小时，谈到半夜，我没发言。当时在江西厅可能也还有几个不同观点的人，就和他们吵了起来。快散会的时候，我找到戚本禹，我说今天你们首长谈话，听的都是一面之词，参加会的都是一派的人。我记得好像也跟江青说了这些话。我实际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说的话很片面，你应该两边都听一下。戚本禹说，行，明天可以考虑再组织一次。

◇ “四·四”逼迫中央文革认错

4月3号说是中央文革听取中学生的意见，结果闹了一场全是激进派参加的会。第二天开会还是在人大会堂江西厅，不过这次会是我组织的。

中央文革原定连续开两天的会，4月3号和北京中学生座谈，4月4号他们在河北厅又召开了一个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座谈会。我知道是这会是召集大学生座谈，按常规来说呢，不通知我去。但我就到市革委会那儿，让文教组负责中学和中央联络的老同志赵唯理用红机子（5）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说4号这个大学生的会我要求参加，提前打个招呼。我就这么去了。

那次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站起来说：各位首长，江青同志说了，不许把昨天的首长讲话用大字报贴在大街上。可昨天后半夜，大字报就上了街。今天一天，我们东城区50所中学的革委会全被冲垮了。现在整个北京几个城区，特别是东城区和西城区，中学一片混乱。军训的解放军已经没法工作了。我希望首长对两边的不同意见都听一听。另外我说，这里在座的很多大学生在当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中央文革当时也承认了是大学生汇报的情况。特别是康生，一会摘眼镜擦擦，一会又戴上，显得很不安，有点尴尬。他后来说，我们也感到这个情况没有听全面，我已经跟付崇碧司令员

道了歉。我们中央文革很多工作，也是靠卫戍区的帮助。所以中学这情况，我们要再重新听一下。江青接着说，你马上通知人来开会，我们再听一下。

于是，我就在大会堂打了几个电话，通知了一些人。我挺公道的，把两派的人都叫来了。后来成为“四·四派”的叫了，前一天来开会的、后来成为“四·三派”的也叫了。

我那会儿真的像个做官的，比较稳重，是以召集人身份听取两边的意见。这些“四·四派”的学生去了，就不像我似的，比较猛。人到了以后，就跟“四·三派”的学生吵得一塌糊涂。从八、九点开始，吵到后半夜。中央文革的人就都从大学生的会上过来了，有江青，戚本禹，康生等。陈伯达没来。

4月4日的会上，“四·四派”坚持的观点是认为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即革命委员会，有老师、有解放军、有学生，是多数，是不应该被拆的。事实上，解放军到了学校以后，维持秩序，各校都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的这些学生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几派里的骨干，工作还是稳定的。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是通过一定程序选举的。这些委员呢，包括“四·三派”的学生，他们当时也都举了手。掌权的这些红卫兵，一度也叫“选兵”，所谓经过选举的红卫兵。卫戍区主导的军训，就基本把北京中学生纳入了正轨。所以对各学校的革委会应当维护。

最后结果呢，是中央文革出来劝架。对“四·三派”昨天会后的做法，他们表明反对。他们提出两点：一是不许攻击解放军，不要再搞破坏，也不要再写攻击军训团、攻击李钟奇的标语。把那些大标语都撕掉。中央文革说，毛主席都通过大标语知道李钟奇了，以后不许炮轰李钟奇。二是补台。因为各校革委会里基本是以首都兵团那个体系为主，属于“四·四派”的，也包括一两个“老兵”里的温和派，还有少量的“四·三派”。中央文革说，革委会可以补台，中学军训还要继续进行。把原来“四·四派”为主的中学红代会，再增补一些“四·三派”成员，作为补台。让解放军两边维持一个平衡，其实也就是维持中学秩序和稳定。

这样，这个会就对4月3号会上片面的东西进行了纠正。对中央文革情绪一激动而表态的错误，主要是对江青和康生煽动破坏的极左思想做了个纠正。而且是康生道歉，向解放军道歉，他们自己又收回了4月3号的讲话。我们事实上占了上风，但是也以此为标志，“四·三派”和“四·四派”就这么公开分裂了。后来，“四·三派”就把我划为“四·四派”了。我说，我很恼火，我是整个中学红代会的头儿，给我分派，不是降我的“官”嘛。

◇ “我是个小小老百姓”

江青可能从开始就觉得我和那些中学生不一样。这次一天之内起了这么大变化，小孩子能像个大人似的反映情况、说出问题，而且不过激，应该是个“当官的料”。因此她关照过我两次。

其中一次就是4月4号那天晚上，我在大学生座谈会上说完那番不同意见后，我起身要走时，江青就把我拉到她身边。我就说，他们昨天没有按照你规定的不许大字报上街，后半夜就上街了。所以今天北京市区的这些中学全乱了，没法工作，希望首长关注这事。她说：小李啊，你反映的那些情况还是对的。我就跟她说，首长，我反映的情况绝对是真实的，还是应该注意的。他们昨天反映的情况绝对是片面的。但是她还是警告了我一句：你注意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走到群众的对立面去。她是很温和跟我讲的。

我估计，这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可能还是需要“四·三派”的声音，所以让我不要脱离“四·三派”。她也找不出我别的毛病。在政治上可以说我基本上左右的意见都反映了，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过度。至于个人生活方面，那时候我还来不及腐化呢。我是很老实的、很憨

厚的一个人。他们觉得我小小年纪，原来也是学生干部，有点小官僚的劲头。

江青这个话就被旁边的陈伯达听到了，他就借题发挥了。我和陈伯达接触过很多次。最早是在1966年底，我给他起草过中学文革的十六条。我写完后，我们《兵团战报》的编辑部一看挺好，就给他送过去了。陈伯达看了以后，还比较欣赏，他认为我能够从宏观上提炼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包括把他也关注的教育革命问题给写出来。里面也提到了学制，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学制，都是一些实际问题，可能是我上中学有那几年身体力行，体会比较深吧。之后，我和陈伯达才有接触。从我给他的印象看，陈伯达可能觉得我想当官。

陈伯达在文革初期，从理论上把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说成是血统论，把“老红卫兵”和“联动”给批判了，宣判了死刑。整个那段时间在政治舞台上就没有中学生的地位了。我们起来之后，陈伯达又支持学生里的极左派、支持拆台派，破坏学校革委会的组织，破坏这种秩序，这可能也是我跟陈伯达的主要矛盾。而陈伯达就在“四三”、“四四”问题上也对我很反感。

在江青警告我不要脱离群众的时候，这个话就被旁边的陈伯达听到后，添油加醋地不断发挥，说我是小官僚。大约是4月13号，在人民大会堂又开了一次关于补台的会。好像是安徽厅，比较大。那次人很多，召集了两个派别的好几百人。这次会呢，有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陈伯达阴阳怪气的讲：什么“四三派”、“四四派”啊，我是不三不四派。会上讲大联合，他说说不三不四。他还说，我这个小小老百姓，是不三不四派，我是个不三不四派的小小老百姓。

我不知为什么，就觉得陈伯达这“小小老百姓”的缘由是冲着我来。冲着我来原因呢就是，在“四三”问题上我能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能不偏不倚、四平八稳，加上江青一句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他认为我是个小官僚。而康生又道了歉，向卫戍区道歉。中央文革很没面子。

那时中学红代会没地方办公，人家推荐了当年的少年宫。少年宫的那些辅导员，一见我们开封，也乐得欢迎我们进去。但是呆了没多久，陈伯达到那儿去转了转，又说我们官僚。说你们都是当官的？然后让我们中学红代会革命化，都赶到外语附中去办公。外语附中给搞了两间破房子，他说这是革命化。《人民日报》接着发了一篇文章，说石家庄的红代会搬到学校里面，据说是陈伯达指示让宣传的样板。

那时他见我面呢，我一伸手，他不跟我握手，说：你们都当了官啦，我是小小老百姓。有一次阿尔巴尼亚使馆搞活动，我们也去了，大家听他有什么指示。陈伯达又故伎重演，见了我以后也是阴阳怪气地说：“我不跟你握手，你们是大官了，有汽车，有秘书。我没有汽车也没秘书，我是小小老百姓。”

但是他除了说我小官僚，始终没有说出我所以然来。我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没有错啊。而且“四三”问题上确实是中央文革错了，他们自己又收回4月3号的讲话。他就用什么大官的形象来描绘我，而且还什么汽车呀、秘书的当众造谣，他这“小小老百姓”就是这么干的。

到了1968年8月份呢，中学生开始要上山下乡。他就开始轰我们这些人走。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见着我以后，一提就是：你怎么还没走啊？这是后话。

◇ 我看红卫兵流派

在中学的文革运动中，如果按左中右来算的话，“老红卫兵”包括后来的“联动”，是保自己父母的，在文革中都可以按右派来算。

实际上老红卫兵，早期那些人呢，应该说是从北大附中的宫小吉写“五分的秘密”开始，到清华附中的“造反精神万岁”的解脱与反抗，这种民主主义萌芽在国民素质上，我觉得都是个启迪。造反精神呢，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合理的事，大家应该有这个权利。这种精神状态还是应该有的。但是“老红卫兵”呢，打人，搞血统论。两红嘛，自来红，红色恐怖，搞这个暴力的东西。这显然是错误的。到1966年12月，陈伯达写的东西，就把老红卫兵，后来的“联动”，其实也还是一帮孩子，给定性为反革命了。其实对早期的老红卫兵，也不能笼统的全否定，反对所有青春向上的东西。

后来的“四·三”派呢，在文革初期受到了“血统论”的迫害。所谓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被老红卫兵挤压，也就酿成了激进的造反精神。于是，翻过来以后，“四·三派”就把老红卫兵，尤其是联动也当成反革命来对待。当初他们的政治作用，一是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是在北师大谭厚兰反二月逆流的时候，做了附应。中央文革很高兴，支持了他们一把。可在毛主席和中央批准成立中学红代会后，中学形势刚刚稳定，又挑起了冲突。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极左。当时，北京中学已经复课闹革命了，尽管那时候连课本都没了，英语也学个Long life Chairman Mao，但毕竟还是好事。结果让他们给搅和了，这些都停下来了。

反过来，“四·三派”认为“四·四派”就是保守派，没有立场，和稀泥，说我立场不稳，是保守，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有他们才是左派。“四·三派”人数不多，但是有革命激情，敢于说极端的话，敢破格做极端的事。他们战斗力强，能突破一些框框而形成一种强势。

当时，遇罗克已经工作，但他是个不是中学生的中学生，也参与了“四·三派”中学生的一些活动。他弟弟那时是25中的初中生，我还当过他们班的辅导员。遇罗克文革中写了“出身论”，并在《中学文革报》发表，影响很大。这样，有些问题也就有了一些理论色彩。在1967年3月18日纪念法国巴黎公社的时候，有人提出了文革以后怎么办，然后讲财产、权力的再分配。有一个逻辑就是，过去地主资本家压迫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就革命性很强。后来呢，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呢，这些老革命就慢慢退化丧失了革命性，因此，文化革命就是要“革过命人的命”。对此，有人称之为“四·三思潮”。当时各派都办了报纸，北京中学生中有三、四份。《中学文革报》是“四·三派”的舆论阵地。有一个时期，它就宣扬“四·三思潮”的一些观点。我认为，这种理论骨子里是反共产党的。这话你今天讲，说是反共产党这种专制，这有道理。但是你那个时候说搞财产、权力再分配，要“革”革过命人的命就太极端了。

中央文革是干共产党这活儿的，你给中央文革拍这种马屁不是要他的命嘛。这种话大学生知道深浅，没人敢说。这帮中学生呢，傻蛋，青春无忌，一说出来，中央文革的人马上堵他的嘴。那时候还很少杀人，作为一个思想错误杀遇罗克，让人很难理解。我觉得中央文革把他抓起来，并很快处决，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央文革实际上是要和他划清界线，所以杀人灭口。

我当时就认为遇罗克不该杀，这太过分了。但是在当时中学运动的作用上，1967年初刚刚趋于稳定的时候，他又给我们搅和添乱，所以我对他也没好感。与右派，像当时的老兵啊，联动分子啊，我们还都可以说一说，拉一拉啊。但是和左派（我们当时认为他们是极左派），却很难沟通。

“四·四派”就是当时的中间派，也是多数派。事实上，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动荡后，中学生中的大部分对上层情况并不了解，都希望稳定。特别1967年春天以后，就希望我们搞复课闹革命。特别在北京城区，部队派人到各中学普遍进行军训。大部分学生都回学校了，开始搞军训、复课闹革命。这样做，就把中学的秩序稳定下来了。但是“四·三派”的公开分裂，就又乱套了。

不久前，我碰上当年红卫兵的头面人物。我说：老兵打也打了，闹也闹了，在历史上也留下了“红色恐怖”和“造反精神万岁”。“四·三派”搞极左，他们独树一帜，冲击一切，现在说成是反对专制的先觉者。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走极端的人，都能留下痕迹，而看不到的是中间派。但收拾摊子的，却是这些中间派的多数。这样，大家才能继续往前走。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